

吴玉章诗词中的“一贯”风范

吴玉章是我国杰出革命家、教育家、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。革命年代，他被誉为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。毛泽东评价他：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，一贯地有益于青年，一贯地有益于革命，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！”“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。”

吴玉章的一生历经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北伐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建设，他的诗虽然不多，但是继承了“诗言志”的传统，是他“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，一贯地有益于青年，一贯地有益于革命”的真实写照。

一贯地有益于革命

“不辞艰险出夔门，救国图强一片心；莫谓东方皆落后，亚洲崛起有黄人。”这首《东游述志》作于1903年的长江三峡。在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，吴玉章毅然离开四川，东渡日本。在留日期间，他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会。1905年革命家邹容在狱中牺牲，深受邹容革命思想影响的吴玉章后来写下《纪念邹容烈士》：“少年壮志扫胡尘，叱咤风云《革命军》。号角一声惊睡梦，英雄四起挽沉沦。剪刀除辫人称快，铁槛捐躯世不平。风雨巴山遗恨远，至今人念大将军。”这首诗深情地表达了他对邹容的敬仰和痛惜之情。1911年，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，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，建立了革命政权。辛亥革命失败后，吴玉章又赴

法国留学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。1925年，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，他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，实现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。吴玉章回忆：“我入党时已经四十七岁。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。从我少年时代起，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，而焦虑，而奔走，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。但是，找了将近三十年，经过失败，胜利，再失败，直到十月革命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，我才找到了真理，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。”吴玉章曾在自己照片题写诗句“中原王气久消磨，四面军声逼楚歌；仗剑纵横摧虏骑，不教荆棘没铜驼”，抗战时期他写下“全民抗战过三秋，老将雄心报国仇。直捣黄龙君莫懈，福星高照古神州”，表达出献身革命的抱负和激情。吴玉章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，每一步都展现出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，“一贯地有益于革命”。

一贯地有益于青年

1960年，吴玉章以82岁高龄写下一首自励诗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人至期颐亦不休。一息尚存须努力，留作青年好范畴。”这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概括，也是对自己的激励，更是对“一贯地有益于青年”的自我要求。吴玉章关心青年，爱护青年，是青年的导师和引路人。正如1965年他在一首送给张鼎丞的诗中写道：“岁华虽变心不变，永做青年引路人。”作为一名学者

兼师表的无产阶级教育家，吴玉章对学习问题，特别是青年的学习特别重视。第一，重视理想教育。他寄语青年，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、立大志；其次要度量衡，决心为国家、人民作一个有用的人才；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。第二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。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，他提倡教学要结合实际，认为学生一经毕业，即服务社会，故在学习中，宜多予各生以研究之机会，要求青年人做到有真才实学，拿出本领，成为工作中高明的人，成为“内行”的专家。第三，坚持终身学习。他指出，我们革命工作的实际斗争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不断学习新的东西，不断开辟新知识的道路。1927年，吴玉章初到莫斯科时，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。尽管年过半百，他仍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学习，一年后就顺利通过了俄语听说读写的难关。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，吴玉章都坚持学习，坚持著书立说，成为革命队伍中著名的学者。1958年他与董必武同游七星岩时写道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我今八十身犹健。意志坚强嗜欲少，热爱劳动可延年。”1959年9月，他还立下座右铭立志要活到老学到老：“并已八十，寡过未能。东隅已失，桑榆非晚……戒骄戒躁，毋怠毋荒。”他为青年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。

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

“人生在世，事业为重。一息尚存，绝不松劲。东风得势，时代更新。趁此时机，奋勇前进。”这是吴玉章1959年11月写下的另一首自励诗，勉

励自己做有益的事，做有利于人民的事。他积极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，普及教育和推广普通话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，影响深远。文字改革是一项有益于广大群众、有益于广大青年、有益于革命的一项重大事业，吴玉章把倡导文字改革作为一生致力的工作：“我已是八十岁的人了。我跟汉字打了几十年的交道，从我个人来说，汉字再难也难不倒我。但是为了工农群众，为了少年儿童，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，我们一定要改革汉字。”这样深厚的情怀，根植于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爱。在推广汉语拼音的实践中，吴玉章始终奋战在第一线，身体力行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。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言：“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滚油煎。毕生不做新民事，枉在人间数十年。”80多岁的他曾亲自到幼儿园听孩子们读书，检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效果，先后前往东北和山西考察，耐心询问农民们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。在他的努力下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在群众中逐步推行了起来。简化汉字给新中国的教育、科学、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作为教育家，无论是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，吴玉章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。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，年逾古稀的吴玉章又在党中央的重托下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，8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登上讲台给大学生讲党史，真正践行了“一息尚存，绝不松劲”，真正做到了“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”“一辈子做好事”。

(据《学习时报》徐小侠 贾猛 著)

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——

凝聚民族力量的抗战强音

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人类解放，救国的责任，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……”

这首展现中华儿女顽强抗敌的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，创作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曾风靡于延安以及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，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士气，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抗战强音。

校歌，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她凝结着办学育人者的理念、使命和愿景，又反映受教育者的感悟、追求和成长的心声。当我们唱起这支以学报国的精神赞歌，一腔爱国心、报国情、强国志便油然而生。

抗大的前身，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，随中央红军长征时改称“干部团”。红军到达陕北后，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，组成“中国工农红军学校”，后改称“西北抗日红军大学”。1937年1月，红军大学第一期随中共中央迁址延安，改为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”（简称“抗大”）。

七七事变后，抗战全面爆发。“学好本领，好上前线去！”成为抗大学子的共同心声。当时，学员们以窑洞为

教室，石头砖块为桌椅，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”的教育方针和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校训的熏陶下，白天苦练杀敌技能，晚上伏案苦读。

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、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，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新的校歌。凯丰受领任务后，深感责任重大。日暮时分，他望着黄土高原苍茫沟壑间随风招展的抗大校旗，看着那一张张斗志昂扬青春面庞，听着汹涌激越的母亲河发出的咆哮，心潮澎湃，百感交集。沉沉群山，寂寂深夜，思考愈深，笔端愈沉。一首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歌词很快在凯丰的笔尖汩汩而出……字里行间，抒不完的是对抗大师生血浓于水的情感，道不尽的是对抗战必胜的信心，满腔家国情怀铺陈作品的底色。毛泽东审阅歌词时称赞，“写得不错，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”。随后，凯丰把歌词交给了刚到延安、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青年作曲家吕骥。

“词写得很深情、细致，立足点很高，看得很远，且有鲜明的形象……”

多年后，吕骥回忆创作过程时说，当时的他激情难抑，想到了横渡黄河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场景。奔腾东去的黄河之水，大浪滔滔，勇往直前，这不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？这不就是抗大学员决死抗日的英雄气概吗？一个主旋律在他心中轰然奏响。

谱曲时，吕骥在旋律上力求清新质朴，要让抗大师生，无论是否通晓音律，都能接受、传唱。仅仅用了两天，他就完成了谱曲。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由此诞生。

好的音乐，发于情，达于心。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的音乐，悦耳且民族性强，节奏流畅，给人以力量。全曲既有一般青年歌曲活泼、富有朝气的特点，又有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不断前进的气势，真切表现了抗大官兵蓬勃的青春活力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。

“成曲后，父亲唱给凯丰听，他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，立即让父亲把歌谱交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。在给罗瑞卿唱了一遍后，他什么也没说就把原稿接了过去，也没说什么时候教同学们试唱。不料两天后，父亲就听见同学们在唱这首歌。”吕骥之女吕英亮在回忆文章中描述道。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抗大先后成立了14所分校、5所陆军中学，分布于西北、华北、华中的广大地域。此后，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，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战旗，回荡着抗大的校歌。

振奋心灵的字句、饱满宽广的情感、慷慨激越的传唱，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是校歌，更是誓词，涌动着炽热情感，承载着丰厚蕴涵。伴着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，一批批“劳动者的先锋”舍生忘死、前赴后继。多少热血青年高唱抗大校歌开赴前线奋勇杀敌，上演一幕幕救亡图存的英雄壮举。

时光荏苒，烽火远去。抗大校歌以其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，已经传唱了85个春秋，成为让人民心弦共振的红色经典。为弘扬抗大精神，赓续光荣传统，1989年1月9日，作为抗大传人的国防大学在首届党代表大会上，将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正式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。在开学典礼、毕业仪式、出征动员等重要集会场合，这首经典军歌总会被年轻学子们高声唱响。她将鼓舞和激励着全校师生永远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，刻苦学习、不懈奋斗……

(据《解放军报》)